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

——以战国策派为中心

水羽信男

## 序言

### (一)问题所在

本文所论述到的《战国策》创刊于1940年4月。从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开始,到同年底汪精卫逃出重庆,再到欧洲战场法西斯取得压倒性优势(代表事件是1940年6月德国攻占巴黎),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成立等等,当时中国抗战的前途一片黑暗,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

当时,在国内政治体制方面,中国国民党(以下略称为“国民党”)以孙中山的建国纲领为基础,展望着宪政,试图实现民主化。在训政体系下,国民党也难以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这一“总力战”(Total War)。国民党为了调动起国内的各种资源,认为有必要推动“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即缩小国内的巨大差别。一般来说,这种矫正过程引起了某种民主化。<sup>①</sup>例如,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以下略称为“参政会”)的成立便是这一动向的象征。虽然参政会无法与民主主义国家的议会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它也成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以下略称为“中共”)在内的多股政治势力公开表明自己立场的地方。参政会的召开,意味着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民主的、公共的空间形成了。<sup>②</sup>

参政会的多数参政员是从抗战爆发前推动政治运动的三党三派<sup>③</sup>的领导干部中选出的。1939年9月以参政会为主要活动场所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爆发。1939年11月,他们又秘密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10月,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共关系恶化,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并于1941年3月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三势力政治开始活跃。

1941年12月,以日本对美英两国开战为起点,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联名签署了《联合国共同宣言》的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民主阵营”的一分子开始接受美英积极的支援。在战争初期,日本节节胜利,然而随着中国抗战逐渐看到胜利的曙光,美国开始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其改组为民主政府。<sup>④</sup>因此,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外出现新的形势,民主化开始成

① 参见山之内靖「戦時動員体制の比較史的考察——今日の日本を理解するために」、『世界』1988年4月号。

② 参见西村成雄「20世紀中国政治史研究」,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11年。

③ 即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乡村建设派、职业教育派、救国会派。

④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主化,除了西村成雄的「20世紀中国政治史研究」以外,还可参见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为争论的焦点。

抗战爆发前成立的三党三派,以及在战争期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小党派被视为相对于国共两党来说独自存在的第三势力。关于第三势力的研究,在日本已有40年的历史。而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第三势力的研究也飞速开展起来。论争主要聚焦于“爱国与民主”。

不过围绕着爱国和民主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众所周知,关于Nationalism和Patriotism的区分一直存在分歧,严谨的研究者把前者翻译为民族主义,把后者翻译为爱国主义。但是笔者对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定义则倾向于丸山真男的古典式的定义,把民族主义理解为“以大众的无定型(amorphous)的国民感情为基础,领导者把这种国民感情从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提升到行动组织化的过程”。<sup>①</sup>如果按照这一定义,对故乡以及亲人的深切的情感(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政治化的表现可以被称为民族主义。在本稿中出现的爱国主义,在意思上等同于民族主义。

关于民主主义,中共阐述了“人民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的正确性,认为“人民民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欺瞒性进行了批判。并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强调意味着对“反革命分子”行使集团暴力的“大民主”的必要性,并强调和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欧美的民主主义不同性质的“民主”观的正统性。其次,在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领域中,自由主义将个体的尊严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民主主义本身意味着由多数来支配。当然自由主义者不否定民主制度,但是他们同时警惕多数决定有时候是错误的,民主主义也有践踏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主义不是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守护自由主义的工具。<sup>②</sup>

或许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台湾)学术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社会主义(Socialism)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三大思潮<sup>③</sup>,而民主主义却不能位列其中,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其政治主义的,时而恣意的不确定性以及定义困难所导致的。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者于2007年出版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のリベリズム』、東方書店),于2012年出版了《中国的爱国与民主——章乃器及其所处时代》(『中国の愛国と民主——章乃器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并以自由主义为关键词,尝试重新探讨中国的近代史。拙作中涉及的罗隆基、施复亮和章乃器三人都是与目前研究较多的三党三派及小党派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

但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第三势力的民主主义运动,就有必要对于三党三派及小党派以外的人物进行分析。就抗日战争时期来说,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昆明的自由主义者加以考察。<sup>④</sup>伴随着抗战的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因拒绝留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天津而辗转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并组织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昆明的自由主义者指的就是以这一批知识分子为中心,并且包含了云南大学教授等在内的学者群体。

“尤以西南联大中之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等五六个人为最劣”,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点名批评,并形容他们是借民主之名破坏民主,以伪自由之名污蔑自由。这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从蒋介石

① 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81年、283頁。

② 关于作为目的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手段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请参见胡伟希《理性与乌托邦:二十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7页。

③ 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仪深:《近代中国政治思潮:从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台北县板桥市,稻乡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水羽信男「昆明における抗戦とリベリズム」、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的这番话中便可窥知一二,因为他们拥有着让蒋介石恐惧的影响力。<sup>①</sup>

## (二)分析方法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19年)之后,东西文化之争正式成为争论的焦点。对外,它与爱国心密切相连;对内,围绕着如何评价本国的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争论依然延续着。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们的想法产生了分歧:1. 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全盘西化”论,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必须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革。2. 这种观点是“本位文化”论,他们认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有益的中国文化具有普遍优越性。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爱国人士,在抗战胜利这一对外的目标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对内的问题上,可以说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同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贯穿了整个近代中国的一个压倒性的问题——贫困,在1940年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基本,认同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然而事实上,在混乱的战争年代,却出现了“发国难财”这样一种现象,贫富的差距反而有增无减。在这样贫困阶层极度苦难的状况下,自由主义者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他们分成了:A. 当下比起自由更注重如何达成平等的一组人;B. 担心一味强调平等很有可能阻碍到个体的尊严,因而更重视自由的一组人。甚至于分别在A、B两组之中,又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1、2)而再度分化。

分化为以下四派:1. 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西洋化是必须的,并以实现平等为目标的罗隆基等人(1·A);2. 追求西洋化的同时也重视自由的胡适等人(1·B);3. 主张保持本位文化、又重视平等的梁漱溟等人(2·A);4. 在相对重视本位文化的同时强调自由的张君劢等人(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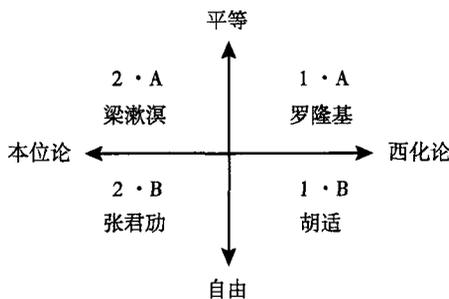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近代思想的格局

本文以此为前提,为了理解20世纪40年代初期昆明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将为《战国策》以及《战国副刊》撰稿的一批知识分子统称为战国策派,并围绕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对战国策派进行探讨。

在关于战国策派的先行研究中,因为他们受到了中共的严厉批判,为了所谓的恢复名誉,不得不将精力集中在确认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与战国策派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有所进展,但笔者认为尝试一些新的讨论也未尝不可。<sup>②</sup> 本稿将在学习有关战国策派先行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其进行分析,尤其是将重点放在林同济、雷海宗、陈铨、沈从文四人的身上。之所以关注这四

<sup>①</sup> 汪朝光:《权威领袖与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由蒋介石的自由民主观论起》,“中国议会百年——政体与正统化之成败工作坊”论文,日本九州大学,2013年7月6日。

<sup>②</sup> 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成为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作品,此后的研究状况请参见袁继峰《战国策派研究述评》,《重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另外,台湾的研究先驱是冯启宏《战国策派之研究》,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近几年最关注的是孔刘辉的研究(《“战国派”新论》,《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

人是因为:1. 林、雷、陈三人被视为战国策派的核心力量<sup>①</sup>;2. 表1中其余二人何永佶和洪思齐未曾投稿过《今日评论》以及后文中叙述的昆明的其他自由主义杂志;3. 至于沈从文,下文将会论述通过他与陈的争论体现出的战国策派的一个特质,并且与雷相比他的撰稿篇数更多。<sup>②</sup>

表1 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一览

姓名	生卒年	学历	1	2	3	供职	1949年以后	撰稿篇数
林同济	1906—1980	清华、伯克利博士	○		○	西南联大	大陆	36
何永佶	1902—1967	清华、哈佛博士				云南大学	大陆	32
陈铨	1906—1969	清华、留美、留德	○	○	○	西南联大	大陆	21
沈从文	1902—1988	从军经验者	○	○	○	西南联大	大陆	9
雷海宗	1902—1962	清华、芝加哥大学博士	○	○		西南联大	大陆	7
洪思齐	1906—1984	协和、里昂大学博士				西南联大	台湾	7

资料来源:参见孔刘辉《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0年第5期。

说明:1为《今日评论》,2为《当代评论》,3为《自由论坛》,此处表示此人是否曾投稿过此杂志。

## 一、关于战国策派

如表1所示,昆明的自由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其中大多数也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就是许纪霖口中“后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sup>③</sup>,他们的大部分在1949年后留在了大陆。

在抗战期间,昆明的自由主义者们公开发行杂志并以此作为他们言论活动的据点。大多数的杂志登载非常少量的广告,也就是所谓的同人志,但是据说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sup>④</sup>以《今日评论》(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为起点,之后有《战国策》(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当代评论》(1941年7月至1944年2月),重庆《大公报》的《战国副刊》(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自由论坛》(1943年2月至1945年3月)相继发行,其中有些杂志发行的时间是相互重叠的。

在《战国策》创刊之际,林同济指出:1. 不能战的国家不能生存;2. 左右倾各字样,意义全消;3. 我们须要倒走两千年,再建“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两千多年来的祖传文化。<sup>⑤</sup>由此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强烈的爱国意识,对于如何救国这一课题,他们并未选择否定传统,而是对其重新审视,

① 李岚:《战国策派与各方论争》,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14页。

② 孔刘辉:《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0年第5期。

③ 许纪霖:《许纪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许纪霖认为第3代(后五四一代)是1895—1910年出生的人。

④ 关于昆明的自由主义者的活动,请参见闾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闾黎明:《抗战风云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谢慧:《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谢慧:《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林建华:《19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创刊号,1940年4月1日。

希望以超越政治对立的大同团结去应对。

从他们这种宽泛的主张中,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并非政党性的组织,其主张也是很灵活的。同一时代的记者范长江就指出,战国策派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成员之间除了“大政治”这一共同认识之外再无其他共通性可言。<sup>①</sup>关于此处的“大政治”,洪思齐是这样解释的:所谓“大政治”是为了实现国家之生存与发展,超越了党派差别,超越了阶级不同,超越了省域差别,而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所执行的政治。<sup>②</sup>

这些与《战国策》有关联的知识分子被左翼知识分子统称为战国策派,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不仅如此,《现代评论》(1924年12月至1928年12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也是胡适盟友的陈源(1896—1970)这样评价:林同济等是受到了德意志思想影响的、跟我们不同性质的一群人。<sup>③</sup>对西南联合大学做过较全面研究的易社强(John Israel)还曾经把战国策派和自由主义派对比评论。<sup>④</sup>以上这些观点时至今日依旧具有其影响力。<sup>⑤</sup>

然而,正如表1所揭示的那样,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为《战国策》撰稿之前,就已经在昆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了。笔者认为,正如江沛所言,在抗战最危急的状况下,《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最能展现出自由主义者是如何应对的。<sup>⑥</sup>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战国策派在当时是自由主义者的一员,自由主义者们相继公开发行杂志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然而不同的杂志不一定会衍生出不同的派系,比如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与战国策派对抗的今日评论派(实际上《今日评论》杂志的主编之一就是雷海宗)。<sup>⑦</sup>笔者认为《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是展现了昆明自由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所持的立场的两本刊物。

## 二、战国策派民主主义论的位相——以林同济、雷海宗的观点为中心

### (一)从与东西文化论争的关联来看

对于以战国时代为分水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林同济指出:

战国以前,没有士大夫,战国以后,没有大夫士。……大夫士是贵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曰“义”流产为“面子”,“礼”流产为“应酬”。“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观,巧变而为“孝、爱、智、生”的四德中心论。<sup>⑧</sup>

① 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1984年编印,第201页。

② 洪思齐:《释大政治》,《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

③ 陈源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指出《战国策》体现了年轻知识分子思想的动摇,从本质上与钱端升和罗隆基的思想有差异。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第482页。

④ John Israel, *Lian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88; 易社强著, 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⑤ 阿部幸夫评价其为“国民党系文化团”。参见阿部幸夫《幻の重慶二流堂——日中戦争下の芸術家群像》,東方書店,2012年,160页。

⑥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第38页。范佩芝在她的硕士论文中曾指出,江沛对自由主义的定义含糊且过于笼统,范认为战国策派和昆明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同的团体。参见范佩芝《抗战时期的救亡思想:战国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张》,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但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笔者认为关于战国策派的议论,受当时中国国内外条件的限制,作为政论基础的政治观是和其他的昆明的自由主义者相同的。

⑦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第12页。

⑧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战国副刊》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林同济当时主张恢复传统,而这个传统不同于普遍被认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它是曾经存在于战国时代,暗藏于当今社会的另一个传统。

而对于普遍与汉族文化被视为一体的、被静态理解的传统文化,雷海宗是如下描述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是在与异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中追求大胆的变化。

中国文化已由古典的第一周进到胡人血统与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了。……我们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①

雷海宗重新解读了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现存于世的中国传统,强调其因受到外部影响而带来的可变性。他认为接受外来文化是现在中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并将目标指向了西洋文明。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肯定异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一立场上,与他们在向昆明这样的内陆地区移动的过程中直接接触到了汉族以外的文化,并亲身感受到了异文化的活力是息息相关的。②

与在当时已经拥有了一定影响力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相比较,林、雷的立场与其甚为不同。③ 与批判西欧的民主主义制度无法扎根于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梁漱溟的言论相比较,林、雷的观点依旧有其不同之处。④ 战国策派主张复活暗藏于世的传统,这与战后费孝通想让西欧民主主义的精华扎根于中国的想法产生了共鸣。⑤ 费孝通也曾在《战国策》上发表过文章。

江沛认为他们的爱国论没有盲目排外,也没有文化保守,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地吸收西洋近代文化的精髓,谋求通过民族主义的胜利获得国家独立,进而实施自由主义的理念,完成宪政并走上自由主义的坦途。⑥ 战国策派是爱国的,但是他们不是向现实低头的爱国者,可以说他们通过重新探讨中国的历史,深化了爱国应相对化这一立场。日本学者阪口直树曾经称战国策派的这种思想为“西体中用”论⑦,关于这一点会在结论中进行论述。

## (二) 自由与平等

林同济指出西洋的近代政治是利用民族主义去调和个人主义与强化政治组织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潮,同时他还如下叙述道:

“人民是国家主人翁”的观念,提高了民众的爱国心和责任心。……原来民主运动,在事实上不只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也是集体主义的促成。……越是这两个潮流发达,越需要民族主义做调人。……它(民族主义)受了个[人]主义的刺激,成为一种富于自觉性自动性的东西,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165页。

② 例如,刘兆吉编《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记载的西南联合大学成员对西南的民俗表现出的吃惊。另外,请对比参考楠原俊代「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知識人研究——もうひとつの長征・国立西南聯合大学への道」,研文出版、1997年。

③ 关于当时的全盘西化论,请参见陈序经《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今日评论》第5卷第3期,1941年1月。在中国最新的研究有夏和顺《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上、下),《观察》第3卷第4、5期,1947年9月。

⑤ 费孝通:《再论双轨政治》,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2日。关于这一点请参见野村浩一「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主・憲政」のゆくえ」(上・中・下),『思想』第1072—1074号,2013年。

⑥ 江沛著、土居智典訳「自由主義と民族主義の葛藤——1930—40年代中国の『戦国策派』の思潮を例として」,『近きに在りて』第54号,2008年。

⑦ 阪口直樹「『戦国派』の文学と文化論」,『十五年戦争期の中国文学:国民党系文化潮流の視角から』,研文出版、1996年、305頁。

因为它乃由个个人都经过自觉工夫而自动接受的。它受了政治组织加强化的影响,成为一种富于组织,实力性的东西,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概念,乃拥一个社会制度以为其执行意志的机关的。<sup>①</sup>

在此可以看出林同济政治论的基调并非是想通过强调民族主义或者集团主义来封杀个人主义的价值。在战国策派的争论中的确可以看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但这是对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膨胀的个人利己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责任感的缺失的批判,绝对不是在否定以个体的尊严为基本的自由的价值。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中国处在极度困难的国际情势之下,无论如何强调对于“变态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批判,他们依旧应被视为自由主义者。<sup>②</sup> 林同济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政治组织的极端强化,其本质并非是解决国内阶级矛盾,而是为了持有国际竞争力的一种策略。<sup>③</sup> 据林同济的理解,平等所具有的价值也不过是为了动员民众的策略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王赣愚是昆明自由主义者的一员,曾为《战国策》撰写过评论。他批判道:虽然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并未否定自由,但是在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自由却是被压制的。<sup>④</sup> 他甚至嘲弄苏联的完全雇用(=经济上的民主)是给予那些放弃了思想的自由去追随权力的人们的报酬。<sup>⑤</sup>

如果把他的观点展开来看,可以说就战国策派的理解,自由比平等更有价值。<sup>⑥</sup> 总结一下战国策派民主主义论的特征,其目标是通过民族主义将个体与集体相结合,至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他们更重视自由。

### 三、战国策派个人主义的位相——以陈铨、沈从文的思想为中心

陈铨严厉地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已经变得官僚化,为了蓄财四处奔走,为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还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充当自己的护身符;另外还批判他们没有英雄崇拜意识,更没有民族意识,对此他指出:

怎么样改变教育方针,怎么样打破中国士大夫阶级的腐化的风气,怎么样发扬中国民族潜在的精神,怎么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sup>⑦</sup>

陈铨此处所说的英雄并不像左翼知识分子批判的那样,不是单指蒋介石<sup>⑧</sup>,而是指莎士比亚、

①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战国副刊》第29、30期,1942年6月17日、24日。

②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③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战国副刊》第29、30期,1942年6月17、24日。

④ 王赣愚:《今日的自由主义》,《今日评论》第4卷第25期,1940年12月22日。

⑤ 王赣愚:《自由与经济制度》,《今日评论》第5卷第7期,1941年2月23日。

⑥ 但是,昆明的自由主义者对苏联的看法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1944年,对苏联实现的经济上平等评价为普遍的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的前提,主张苏联的政治必然实行民主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苏联的阶级独裁论能适用于中国(赣:《社评对苏联政治应有的认识》,《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引起这种认识的变化的国际因素之一是共产国际的解散(恭:《第三国际的解散》,《当代评论》第3卷第20期,1943年6月6日)。

⑦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⑧ 中共批判陈铨的观点是拥护蒋介石独裁的,其实这明显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的。关于中共的这种批判的问题在中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如,王向远:《“战国策派”和“日本浪漫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

康德、马丁·路德等在文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各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才们。众所周知，陈铨的思想受到了尼采的深刻影响，此处所说的英雄便是尼采口中“精通古代的泉源的人”“最后就会探求未来之泉，探求新的泉源”的人。<sup>①</sup>

除此之外，陈铨认为崇拜英雄也不应盲从，应当明确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这不同于“奴隶服从”。他在这种崇拜英雄之人身上寻找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一种不顾利害关系而去拥护美好、拥护正义的精神。

然而陈铨的观点极具论争性，他所使用的修辞很有可能全面地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因此立即受到了沈从文的批判。沈认为陈的英雄崇拜事实上很有可能被误解为他在赞美墨索里尼、希特勒之辈，于是对此展开批判并摆出不要英雄崇拜的辩论阵势。

国家要集权，真正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还值得来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为要“未来”必与“过去”一样，对中国进步实有重要的意义！<sup>②</sup>

陈铨的想法与沈从文大相径庭，陈铨着重强调新文化运动之后极端膨胀的利己主义所带来的弊害，而沈从文则主张应当承认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认为“有形的社会组织与无形的公民观念，都无不在逐渐进步中”。<sup>③</sup>

从那以后，包括左派在内的许多人都曾针对陈铨的英雄崇拜发表过自己的意见，陈铨在距最初提出这个问题大约两年后的1942年4月21日，在《战国副刊》第21期上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他再次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必须剪除。‘天赋人权’的学说、平等的理论，必须加以正当的解释。”<sup>④</sup>

陈铨为何会如此执拗地对现状进行批判呢？是因为他对当时的中国现状有以下绝望的想法：

人人都自以为天才，人人都不佩服别人的天才，人人都想取得领导的地位，人人没有领导的能力，仇恨嫉妒，争权夺利，高尚的行动不可能，团体的生活都涣散，到了这种局面，就有英雄出来，也不能挽回世运，他虽然抱着一腔光明磊落的心事，超群绝类的才能，也只有乘桴浮海，啸傲山林，或者乃竟受人诅咒，终于押上断头台，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葬送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命！<sup>⑤</sup>

这种想法，近似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阐述的苦恼。鲁迅1907年在东京游学时曾指出：

非彼[精神界之战士]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sup>⑥</sup>

鲁迅从这种绝望中，产生了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为了成为超人的垫脚石，愿意

① 尼采著，钱春绮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0—251页。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隽语(Epigram)中也引用了这句话。

② 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③ 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④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战国副刊》第21期，1942年4月21日。

⑤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战国副刊》第21期，1942年4月21日。

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2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自己没落下去这一想法的共鸣。<sup>①</sup>因此,陈铨的立场与鲁迅是一样的。陈铨也称赞爱英雄、惜英雄、帮助那些落难的英雄的人,并且像上文所述那样,他期望他们抱有为了英雄宁愿牺牲自我的精神。

当然,笔者对鲁迅与陈铨之间的思想差异表示理解,并不想轻易地结合两者的思想。但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即使在思想上存在深浅的差异,但超越思想与政治的立场,鼓励知识分子接受尼采思想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在认识到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人群中,也确实存在抵抗中国的“萧条”之知识分子。<sup>②</sup>

再回到陈铨的观点来讨论,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英雄存在与否,而是缺少支持英雄的力量。陈铨对沈从文等人的批判进行反驳并主张“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sup>③</sup>

但笔者在此不但要指出陈铨与沈从文的思想差异,还要指出两者思想的共同点。沈从文向来以乡下人自居,他非常关注生活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底层民众,并认为这样的人能够救中国。<sup>④</sup>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沈从文,陈铨也从底层民众在艰苦中求生存的淳朴的能动性中看到了中国重生的希望。<sup>⑤</sup>陈铨并不认同一部分精英(英雄)就能够推动历史的愚民思想。

而且沈从文属于批判英雄崇拜派,但他指出国民的“自尊心”即“个人做‘人’的自尊心”支撑着中国的民族主义。<sup>⑥</sup>同样,陈铨在1940年和1942年的关于英雄崇拜的评论中曾表达了以下观点:

真正的历史家的工作,倒不在仅仅解释物质条件的力量,假如他的历史是为人类写的,他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说明人类在某种物质条件之下,他怎么样凭藉他伟大的意志,去解决一切的困难。他们努力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进展的情况。<sup>⑦</sup>

在这场论争中,虽然两者对中间层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人类的积极主动的觉悟推动了历史发展这一观点是相通的。

如果附加说明的话,陈铨的代表作《野玫瑰》(1941年8月,昆明初演)所描述的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想法发挥自己的能力,最后为了国家民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一个爱国的故事。这个女主人公就是英雄,被她感动的观众就是崇拜英雄的人。陈铨认为正是这样的人能够推动历史,他的作品承认个人存在能力上的差别,同时也探讨个人积极求生存的价值,这就是表达个人主义的作品。

陈铨和沈从文两者在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有所差别的同时,对于历史的主体——人类的尊严,都

① 代田智明「鲁迅を读み解く——謎と不思議の小説10編」、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40頁。

② 参见郁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成芳编:《我看尼采——中国学者论尼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战国副刊》第21期,1942年4月21日。

④ 关于沈从文对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底层民众表现出的怜爱以及高度的评价,参见 Jeffrey C. Kinkley, "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金介甫著,虞建华译:《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⑥ 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⑦ 参见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陈铨:《再论英雄崇拜》,《战国副刊》第21期,1942年4月21日。

表示不仅应该尊重全体,还应该尊重个体。尽管陈铨曾强烈地批判“个人主义”,笔者还是坚持把陈铨定位为个人主义者。不管怎样,在那种时代和环境中,陈铨的文学作品中,含有不丧失自我、保持自律的特质,这一点和沈从文也是相同的。

## 结 论

### (一) 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

众所周知,战国策派成员持有强烈的对外民族主义。本文要确认的是,围绕自由与平等,战国策派成员认为,利用民族主义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统一,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过程。他们并非把民族主义视为压制个体尊严的工具,而是把其当作调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包括个体尊严在内)与社会、国家的重要性的工具。他们用相对化的视点来处理民族主义。

在对内民族主义问题上,即在围绕全盘西化还是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中,如果定位战国策派的观点的话,林同济与雷海宗强调了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内来说,战国策派是重视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然而他们与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也要求积极地吸取西方文明。

战国策派的最终目标是把西方文化根植于中国,因此正如上文所述阪口对其评价的那样,具有“西体中用”的性质。但是,对战国策派而言,西洋文化是使中国文明发展下去必不可少的条件,换言之,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东方文化能够接受并使用的先进文化,把那个精华的、先进的部分拿出来是很必要的,同时,他们把中国本身也具备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条件作为争论的前提。

这与曾经为《战国策》撰稿的费孝通在抗战胜利后的东西文化之争中表明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笔者认为,这种倾向指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性,同时与强调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沈从文的立场基本上也是重合的。这也许是当时昆明自由主义者们的共同立场。如果真是这样,战国策派对传统的高度评价就不仅仅是“附会”论了。笔者认为,战国策派的文化论,并不是要全盘西化,也不是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强调文化的纯粹性,而是要使中国文化带着全新的普遍性重生。他们借助传统文化使西洋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目标在于重建一个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全世界通用的中国文明,其文化论的见解极为精辟独到。

### (二) 自由与平等

战国策派是把“个体的尊严”视为根本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他们更重视的是自由而不是平等,而且是“消极的自由”。关于这点补充如下,沈从文指出,如果作品提出了改善中国社会“愚”与“诈”、“虚伪”与“自大”的方法,就算这种作品与抗日宣传好像无关系,它倒与中国民族如何挣扎图存大有关系。<sup>①</sup> 对于他把重新树立人生观等非常个人的问题与中国的图存这种政治问题相结合的一点,可以将其定位于自鲁迅以来想要改造“国民性”的一派。但是,笔者关注他的文学作品不必非要与抗日战争相关的这一观点。沈从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反复提倡作家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的重要性。<sup>②</sup> 在《战国策》、《战国副刊》等杂志上撰稿时,他也反复指出避免让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他曾揶揄,作为文人就应当踏踏实实写好文章,没必要成为在文坛上发

① 沈从文:《一般与特殊》,《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

② 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10月25日。他提倡“反差不多”,强调加深作家自身个性的必要性。

挥权势的“政客”。<sup>①</sup>

关于沈从文的基本立场,在要求重建中国这一点上是属于民族主义的,关于文学作品的创造方面,他的基本观点是作家的个性并不是单一的,而作为文人应该写自己的思想。如果是那样,沈从文试图排除,像要求中国的作家应当写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这种来自外部的干涉这一点,可以说他是尊重“消极自由”的。沈从文并不认为,全体人民应当向着特定的政治目标自发的迈进是正确的,并且不赞成这种“积极自由”的立场。

正如上文所述,从《再论英雄崇拜》中可以看出陈铨的恐惧:有才之士,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被扼杀。也就是说,过度的平等化会使个性受到压制,阻碍那些拥有高能力人的发挥。<sup>②</sup>因此,对战国策派来说,平等并不一定是实现自由的魔法棒。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还应与他们对“消极的自由”的重视结合起来。

### (三) 战国策派思想的相位及其可能性

在如何看待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上,他们是更强调自由,甚至是“消极的自由”的一群人,如图1所示,他们的立场处于胡适与张君勱之间。胡与张皆在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而战国策派中的大多数人则选择留下,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特征之一。

另外,与三党三派的核心人物罗隆基、梁漱溟(重视平等,因而在1949年支持革命)相比较,战国策派与他们也站在不同的立场。今后的研究应继续就昆明自由主义者对于“消极的自由”采取何种立场进行探讨。而且在分析昆明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时,应该参照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来确定其立场。

但是,战国策派,哪怕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依然坚持表明其更重视“消极的自由”的立场,这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值得受到更多的瞩目。在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这是从日中战争开始,经过内战,直到20世纪50年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形态。

然而,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对战国策派的批判相当猛烈。从20世纪30年代对沈从文执拗的批判开始,到对陈铨《野玫瑰》的批判,甚至给战国策派贴上了法西斯的标签等等。这些批判中,有些是误解,但毫无根据的批判也不在少数,极尽可能压缩了战国策派的公共言论空间。<sup>③</sup>

陈铨在《再论英雄崇拜》中,对于持唯物史观的论者的批判,他评价道:“他们却的确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可见,他认为即使是在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论者之间,也是可以交换意见的。而且,在战国策派内部,不仅仅存在围绕“英雄崇拜”的争论,比如潘光旦的优生学也是存在争论的。<sup>④</sup>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战争这一危机状况之下,在受到国内政治情况影响的同时,仍然通过自己的杂志,为创造一个公开的、自由的言论空间进行了努力。

[作者水羽信男,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译者郑晓琳,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② 这种危机观念,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1907年)等文中也有提示。参见《鲁迅全集》第2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

③ 关于当时对陈铨的批判,请参见李岚《战国策派与各方论争》,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

④ 参见水羽信男「昆明における抗戦とリベラリズム」、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